

法律  
新知

# 与骸骨 交谈

我希望  
每一个案件  
都有答案

(美)威廉姆·R·美普斯

(美)麦克·C·布朗宁 著

尚晓雷 译

# 与骸骨 交谈

(美) 威廉姆·R·美普斯  
(美) 麦克·C·布朗宁 著  
尚晓蕾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骸骨交谈:我希望每一个案件都有答案 / (美)  
威廉姆·R. 美普斯, (美) 麦克·C. 布朗宁著; 尚晓蕾译

—3 版.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7. 5

(法律·新知)

书名原文: Dead Men Do Tell Tales

ISBN 978 - 7 - 5197 - 0868 - 9

I. ①与… II. ①威…②麦…③尚… III. ①骨骼—  
法医学检验 IV. ①D9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0589 号

与骸骨交谈:我希望每一个案件都有答案  
YU HAIGU JIAOTAN:WO XIWANG MEIYIGE  
ANJIAN DOUYOU DA'AN

(美)威廉姆·  
R. 美普斯 著  
(美)麦克·  
C. 布朗宁

策划编辑 吴剑虹  
责任编辑 吕丽丽  
装帧设计 马 帅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杜 进  
责任印制 吕亚莉

编辑统筹 社项目运营中心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15 千  
版本 2017 年 7 月第 3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网址/www.lawpress.com.cn

投稿邮箱/info@lawpress.com.cn

举报维权邮箱/jbwq@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销售电话:

统一销售客服/400-660-6393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30678 重庆分公司/023-67453036

上海分公司/021-62071639/1636 深圳分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97 - 0868 - 9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1	每天都是万圣节 .....	1
2	健谈的头骨们 .....	23
3	“骨头的捆绑” .....	37
4	“环抱的大地” .....	53
5	破碎的残骸 .....	69
6	当你病入灵魂 .....	85
7	与魔鬼赛跑的人 .....	101
8	反常的自然 .....	117
9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	131
10	火与瓮 .....	151
11	碎尸万段 .....	169
12	遗失的军团 .....	215
13	被错放的征服者 .....	237
14	碑与“老马虎” .....	255
15	所有俄国人的沙皇 .....	271
16	这些潦草的记录和我们的死尸 .....	305
	致谢 .....	319

## 每天都是万圣节

我获准离开,前往死谷,去满足我应受谴责的好奇心……死亡像镰刀收割庄稼一样掠过此地,火焰把最后的残余扫清……一具具尸体半埋在灰烬中:有些保留着因子弹一击毙命、遽然瘫软、撒手人寰的难看死相;但更多的遗骸则呈现出饱受烈焰煎熬的痛苦姿态。他们的衣服或许能有残留,而眉毛和胡子却早被全部烧光;迟来的雨水甚至不能将他们的指甲保留下来。有些尸体足足胀大了一倍,另一些则萎缩成侏儒状。根据曝尸的程度,他们的脸有的胀大、变黑,有的则缩小、变黄。肌肉的收缩使他们双手蜷曲,也让每一张面孔都挂上了龇牙咧嘴的恐怖笑容。呜呼……

——安布鲁斯·毕尔斯:《夏伊洛见闻》<sup>①</sup>

<sup>①</sup> 安布鲁斯·毕尔斯(Ambrose Bierce):美国作家、新闻专栏作家、讽刺作家和评论家;他擅长短篇小说创作,一生充满神秘、矛盾和悲伤情结。夏伊洛:美国田纳西州一公园,南北战争时战场。——译者注

我很少做噩梦。偶尔梦到的也是一些日常工作中所见的画面：碎裂、洞穿的头骨；被砍掉的残肢和严重损坏的头颅；烧焦或者腐烂的尸身；簇簇毛发，森森白骨……在我工作的地方——设立在佛罗里达大学里的佛州自然历史博物馆下属的 C. A. 庞德人类鉴定实验室里，每天都会看到这些。最近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一个遥远的乡间试穿一双皮鞋。那双鞋的皮子没有经过正确的处理，以至于鞋带和鞋面上都爬满了蛆虫。不过，对于这个奇异的梦境，我有一个很自然的解释：作为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一名接受我指导的学生，正在养蛆。

我曾千万次地凝视死亡的面孔，见证过它各种各样残酷的形态。死亡并没有让我毛骨悚然的力量，它不能刺激我的神经，或者左右我的判断力。死亡于我，并不是夜晚来袭的恶灵，而是日间相处的伙伴，它是熟悉的情景，且存在于一个服从科学法则并应对科学询问的过程之中。

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万圣节。想想你这辈子看过的每一部恐怖电影吧，它们加起来，也不过是我每天所经历着的工作中，微不足道、毫不新奇的寻常一瞬。我们的实验室主要是为了向佛罗里达大学的研究生讲授体质人类学而设置的，同时也隶属于佛州自然历史博物馆。但是，拜 1917 年博物馆成立时的法律所赐，我们经常参与非正常死亡案件的调查，去尝试拨开围绕在谋杀和自杀案件周围的重重迷雾。在过去旧有的尸检系统下，有太多无辜死者的冤屈并没有得到昭雪，而作恶者则逍遥法外。那是因为，调查者缺乏勇气、知识、经验和毅力；他们没有把双手深深埋入那些可怕罪行残留的腐烂遗迹中去仔细摸索、搜查，从遗骸中抓住那微微闪耀的“真相之光”。

真相是可以被发现的,真相也希望被发现:1918年谋杀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全家的凶手们以为他们的罪行将永远长埋于地下,但是仅仅60年之后,遇难者的遗骸在重见天日之际,就成了那些布尔什维克杀手们罪恶的见证;我曾见过细小纤薄的婴儿遗骨在法庭上作为证据,让一个粗壮硬朗的中年杀手面色苍白,在悔恨中被送上电椅;我还见过一块偶然在河底发现的女性头骨残片,它带着鳄鱼噬咬过的痕迹,却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在事发两年之后,把杀害她的“斧头杀手”绳之以法……

一旦运用得法,法医人类学还可以解开历史谜团,赶走百年来困扰着学术界的梦魇:我曾经却之不恭地仔细检查过查克瑞·泰勒总统的遗骨,他死于1850年,一直以来都有人怀疑他是美国第一个被暗杀的总统,我的检查结论帮助他们消除了怀疑;我也曾检查过被残杀的16世纪西班牙远征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头骨。这块球状的骨骼,这曾经盛载着黄金、鲜血和王朝梦想的头颅,如今被我举在手上,那上面剑刺的伤痕清晰可见;经我检查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象人”,那怪兽状的骨架,给了我既深刻又生动的印象,就好像在与他本人交谈一样。

但是我从不是为了扬名立万而刻意去调查那些著名的死亡案件。对我来说,那些无名氏的骨骸已经足以让人惊叹。我经手过一个最奇特的案件,主人公是一对曾经热恋痴缠的男女,他们有着很普通的名字:米克和詹宁斯。我的工作是他俩经焚烧、碾压再混杂到一起的上千块碎骨,从一个尸袋里倒出来,尽我所能去拼回原状。一年半之后,当我最终完成这项工作时,得到的,是深深存在于我们所有人

身体最中心的,在我们经过切割、焚烧、解体或腐化之后最终留存的,我们身上最强壮、最坚强和最不易被毁坏的,我们最稳固的同盟、最可信的伙伴,我们死后仍然长期延续的存在——我们的骨骼。

我经常思忖自己是否有性格缺陷,让我对和死亡有关的事着迷。我总是期望看到人类存在的事实真相,不管那是多么丑陋。从年少时开始,我就想看到生命本身的样子。我并不想通过被渲染过的报纸专栏报道或者电影胶片上忽隐忽现的画面去看,我想看到未经处理过的现实版本。这不是说我想从打印整齐的验尸报告里,或者丧葬现场不锈钢棺材里面被鲜花环绕的尸体上了解死亡,我毕生所感到好奇的,是死亡本身和它实际发生的过程。

1937年8月7日,我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我的祖父是卫理公会派的牧师,外祖父是鞍马匠。我爸爸是个银行家,他40岁的时候就死于癌症,当时我才11岁。爸爸是一个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并且重视教育的人。我生长的环境里充满了各种图书和《柯里尔周刊》《周六晚邮报》这类报纸杂志。在我们家的图书馆里,字典是最常被用到的一种书,阅读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爸爸去世9个月前,我就知道他不会康复了,谁也无回天。这带给我莫大的悲痛。但是在最后的日子,他留下的话又让我充满自豪。那次,他正在跟我妈妈交代一些后事,他嘱咐她一定要让我那运动健将的哥哥考上大学。但他没有提到我。

“那比利呢?”我妈妈问他。

“不用担心比利,他会没事的。”爸爸回答。他临终前对我的信心让我一生铭记。



在我脑子里深深扎根的，还有童年时一桩带有启示性的事件，这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雌雄大盗”<sup>①</sup>传奇中的女罪犯邦妮·帕克有关。她和我的人生相交过两次，虽然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死了。邦妮是达拉斯人，她第一次遇到从瓦可 (Waco) 来的克莱德，是在达拉斯附近靠近三圣河谷的“水泥城”，她在那里当女招待。随后，这对情侣一路杀过得州和中西部地区。在我的孩提时代，他们的故事仍然鲜活，当时我家正好就在达拉斯警署副警长家对面。

这位副警长是我父亲的朋友，有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带来了邦妮·帕克和克莱德·巴罗的尸检照片。我获准观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尸检照片，立即被深深吸引了。那时我才 10 岁出头，非但没有被吓坏，反而着了迷。几年后，我偶然在一个埋葬着我家先辈的公共墓地中走过，一块墓碑上刻着的铭文映入眼帘：

就像花朵因为阳光和雨露才变得更为娇美，  
这个古老的世界因为曾经有你才变得更为亮丽。

这行小诗的上面对刻着：

邦尼·帕克

1910 年 10 月 1 日—1934 年 5 月 23 日

<sup>①</sup> 邦妮和克莱德 (Bonnie and Clyde)。

我震惊了。这行诗也许应该用来形容一个孩童或者少女，而不是一个被一排子弹击毙的抽雪茄烟的女杀手！

后来我拍下了墓碑的照片。之后很多次的讲座上，我会先把那句小诗的照片展示出来，而下一张则是完整墓碑的照片，包括上面的名字：邦妮·帕克。从在达拉斯那个墓地看到那块碑开始，我意识到，每一个人，从最邪恶的连环杀手，到天使一样纯净的无辜者，生前都曾经被人爱过。受害者和凶手都是人。他们或者无助地，或者自愿地选择了他们的人生道路，但是路的终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坟墓。所有这些人需要并且理应得到像我这样的调查者细心而冷静的验证。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法庭或者公众，我们在检验台上看到的尸体首先和受害者的家人、凶手的家人紧密相连。阳光和雨露看上去和显微镜以及解剖电锯相去甚远，但它们仍然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侧面。我妻子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和我父亲都葬在那块墓地，邦妮·帕克同样躺在那里。

我的成长环境无关宗教，却有一套严格清晰的道德价值观。谎言和懒惰对我来说比最骇人的死尸还要可恶。如果你想探询人类的灵魂是否存在，或者衡量是否有来生，那么你最好到本书之外去寻找答案。虽然我见过彻头彻尾的魔鬼和他们的行径，但我从未被吓倒过，也对成为魔鬼的卑劣途径和手段不感兴趣。对于生活的阴暗面，我并无个人喜好，也从未试图爬进地沟或者透过下水道滤网去探寻生活中的污秽行为。我对酒吧、夜店和妓院不感兴趣，虽然我曾被拉去处理和检查那些常客们的尸体。

每当被问到我会为什么会从事法医人类学，我都会告诉他们，是好

运气和怪性格的联合作用。当我还是得州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时候，完全出于偶然选读了第一门人类学课程。当时，课程注册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期了。我们这些新生永远被排在最后选课，所有生物学的入门课程都排满了，辅导员建议我选人类学作为替补。

“好吧，那是什么课？”我问他。

“试听一下吧，也许你会喜欢的。”他回答。就这样，我跑去上了体质人类学。整个大学期间我都在主修英语文学，辅修人类学，直到毕业前的一个学期，才把人类学转为主修专业。这个专业有一门必修课是高级体质人类学，主讲人是一个刚来不久的老师，他叫汤姆·麦肯(Tom McKern)。

除了我父亲，麦肯是对我人生影响和指引最大的人。麦肯是……就是麦肯。他很有个性，天生是当老师的料。他充满人格魅力，是个高明的讲师。我很快了解到麦肯出生在汤加，父亲是一名考古学家。麦肯有着丰富的海外经验。他曾经在东京的一个实验室工作过，辨别“二战”期间在硫磺岛阵亡的美军士兵的遗骸。后来还去过韩国。在被送去辨认的硫磺岛战役遗骸中，竟有一具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结婚时的伴郎。有着非凡经历的麦肯，周身仿佛有种光彩围绕，每一位与他接触过的学生都被他迷住，对他印象深刻。正是他，让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一名法医人类学家。

第一堂课，麦肯只是简单点了个名然后就宣布下课了。我们几个人留下来跟他聊天。他解释了什么是法医人类学及其包括的内容。他给我们讲述出庭作证和调查谋杀案的经历。他说，干这种独特又迷人的工作可以每天多挣一百块钱，只要你能出庭。我们都被

这一大笔钱震惊了。那次谈话最多进行了半个小时,但是这半个小时过去,我走出教室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了。

我从 18 岁时起,就开始自食其力。我从事过一系列非常奇怪的工作来负担我的大学学费。我曾在一家私人疗养院当过助手,有时候不得不制服有暴力倾向或者出现幻觉的病人。我也曾经坐在殡仪馆的急救车上,熟练地从副驾驶的位置探身出去,往车祸现场扭曲的死尸身上抛掷印有我们标志的床单。各殡仪馆之间对新生意的竞争非常激烈,让我们的工作有些像“死亡牛仔”的比赛,哪个牛仔的绳圈最先套到小牛的脖子上就算胜利。只不过我们用的不是绳圈,是床单;我们要套的不是小牛,是死尸。

在得州的星空下高速追逐,那是野性十足的日子。我们会像地狱飞出的蝙蝠一样,冲到事故现场,冒着生命危险把死人从沥青路面上抬出来,赢得那场竞争。我们赶到那里的速度常常比受害人死在那里的速度还快。我们的急救车最高时速 105 英里,配置的是低速变速器。我们竞争对手的车时速可以达到 110 英里,配置的是高速变速器。变速器的区别在于,对手可以在乡间平坦的土路上让我们望尘莫及,但是在城里,低速时加速更快的我们,就能把他们甩在身后。

当我们以这种生死时速飙车的时候,还没有安全带这回事。<sup>①</sup>无论我们怎么说,殡仪馆的老板都不愿花钱购买保护装置。那老头

---

<sup>①</sup> 作者此处的经历,和安全带在美国推广的历史相关:以前只有安全系数不高的两点式安全带,1958 年美国福特公司旗下的沃尔沃发明了三带式安全带,1967 年美国正式通过驾车、乘车须系安全带的法案,此后三点式安全带才被广泛接受。——译者注

是个人物。我记得他拿出一叠城里每一家改装车协会的会员卡——他在每家都入了会——像洗牌似的，在桌面上得意洋洋地把玩着那堆卡片……“看见了么？”他笑得很邪恶，“每一桩都是丧事！”

后来有天夜里，老板自己开着救护车上路时，他目睹了一场极其惨烈的车祸。一辆越野大卡车撞上了一辆小轿车的后防护板，把小车撞得飞转起来。小车的司机没有安全带，像游乐场里荡秋千的小孩儿一样被甩了出来，又掉在卡车前面。卡车的前轮把他的头压扁了。连老板的铁石心肠都被那具尸体血肉模糊的惨象触动了，不久之后，他就给我们的救护车装上了安全带。

我以前也参加过葬礼，但直到在殡仪馆打工时，我才第一次看到棺材之外的尸体。就在我上班第一天的夜里，一通电话把我们叫去奥斯汀的一所住宅，说那里有个女人胸口剧痛。我们抵达时，她蜷缩在床和墙壁之间的地上，几乎什么都没穿。她还活着，我们尽量轻地把她抬出来，抬上担架，抬进救护车，在去医院的路上给她输了氧气。我一路上都在安慰她；结果，在她被抬进急救室几分钟以后，却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

一位姓沃森的老法官——我忘了他的名字——前来宣布她的死因。法官脖子后面的椎骨都长在一起了，以致已经没法转动脑袋了，所以他只得把整个身体、肩膀连同头部一起扭动。他来了之后，低头看了看尸体，然后像个灯塔一样左右转了半分钟，吐出两个字：

“心梗！”

这就是全部。这就是最终的宣判。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接受权威的管制。她好像已经沉入了一片黑暗之海。硬脖

子的老法官蹒跚着走出了房间，留下我们和那具沉默的躯壳。那两个字是她当晚最终也是唯一的墓志铭，而这种突如其来的结局让我震撼莫名。

那些日子的某些场景，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某个深夜我们被叫到一个家庭暴力的现场，一名跛脚的丈夫用拐杖和四柱床的黄铜床腿痛打他的妻子。我也记得另一起案件，一个男人在参与斗殴时被人用番茄酱瓶子击中了头部。我们到达的时候，整个现场看上去都像翻滚在红色的海洋里。我可以忍受流血的场面，但是我受不了血的气味。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体里不可能流出那么多血来。确实不能。那片红色海洋的一部分其实是番茄酱。那个男人活了下来，也许他之后又会去参与别的殴斗。我还记得自己曾经从一辆倾翻的汽车下面救出一位年轻人。他断了一条胳膊，呻吟着问我要把他带去哪里。一听我说“医院”，他就用断臂和另外那只完好的手臂挣脱我，想要逃走，我能做的只有把他按住——原来，那辆车是他偷的。

在那些夜晚我见识了很多恐怖的景象，但我不能眨眼分神或者转身走开。我的工作全赖于此。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了对我意志的考验，看我是否足够坚强，能够毫不畏缩地直面各种事故的惨烈后果。急诊室的医生们也要面对相似的情形，但是我认为他们看到的伤患已是经由我们这些开救护车的人处理得相当干净以后的模样。我们一到现场，就被卷入全然的混乱中：天很黑；汽车或者翻覆，或者正在起火；人群在尖叫，警察狂喊着，玻璃碎裂，空中弥漫着洒落的汽油和烧焦的血肉的新鲜气息。在车祸现场出现的戏剧性场面，比之

后在急诊室里出现得要多。医院里是没有阴影的,一切都洁净、明亮,没有异味。干净的床单和闪亮的器械营造了一种相对冷静和可控的气氛,恐惧感已经开始退去了。

我第一次观看尸检是在18岁那年。那时,奥斯汀市的大部分尸检都是在丧葬公司进行的,现在很多地方仍然如此。病理学家会赶来进行取样、称重和拍照的工作。有的专家对我们这些外行很和善友好。他们允许我们留下来看,并且在过程中随时提问。逐渐地,我开始接触腐烂和严重受损的尸体。我供职的丧葬公司有一项合同工作,是处理军事飞机坠毁后的士兵的遗体。我见过几乎被烧成炭的尸体,也见过从墨西哥湾里打捞上来的泡得发白的飞行员的尸体。很多个夜晚我都睡在停尸房里,那是很奇特的经历,那些堆积如山的、装有烧焦的尸体的尸袋与我仅一门之隔,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也是在这段时间,我慢慢培养出了一边和死尸相伴,一边吃东西的能力。我还记得一次尸检结束后,我在验尸房吃辣椒奶酪汉堡,我仔细地查看了汉堡包的内容,然后咬下一口,又一口,再一口。

我见过强悍的警员们用抽雪茄烟来赶走鼻孔中充斥的尸臭味。记得有一次,法医一边在一具烧焦的尸体上切开已经半熟的软组织,一边幽默地说:“好吧,我想今天午餐没人想吃烧烤了吧。”然后,只见因为恶心而脸色发绿的警员们忙不迭地从屋里跑了出去!

我的生活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双重人格”的状态。白天,作为英语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我会凝视狄更斯、特洛罗普和莎士比亚的荣光;夜晚,我会进入另一个充满可怕痛苦、残酷不幸的世界,充满火焰

和螺纹钢的世界,充满瘀伤、骨折和流血的世界。我研究十四行诗,也研究自杀。我看到悲剧被印刷在纸上,也蜷伏在柏油马路上。我解构英格兰不朽的诗篇,也目击得州的男女死者躺在不锈钢的解剖台上,在灯光下,被小心地切成一片片。

然后,我毕业了。1959年1月我从得大获得了学士学位,之前一个月玛格丽特和我结了婚。麦肯鼓励我跳过硕士,直接报读人类学的博士学位。得州大学没有人类学的博士课程,麦肯建议我报读其他学校的课程,而他可以私下指导我。但我还是决定先读硕士。

这个决定并不高明。我在研究生院疲于奔命,试图通过兼职当实验室技师和批改试卷的助教来保持收支平衡。有个夏天我打了两份工,每周要工作44个小时。一份工作是在智障儿童学校当体育老师,另一份是医院护工。同时我还要兼顾全日制的硕士课程。一年半之后,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知道,长此以往我将一无所获。所以,当玛格丽特拿到她的教育学学位之后,我离开了学校,搬到达拉斯,在哈特福德的一家保险公司找了一份调查员的工作。

一位年长的病理学家曾经告诉我:当你有所怀疑的时候,往坏的方面想,90%的情况下你是对的。这是个很好的建议,在调查保险索赔时,我屡试不爽。虽然我很厌恶这份工作以及因此而接触到的那些人间败类,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日后成为法医人类学家所获得的最好的锻炼。如果一个年轻人想迅速地了解他的同类能够卑鄙到何种程度,那就让他去做保险索赔调解人吧。在他天真的灵魂里,无论有什么样无私善良的花朵开放,我保证在6个月之内都会被连根拔起。同时,他将见识到一些人为制造的最逼真、最智慧又可信的假



象,是的,我就经历过。

我不应该纠缠于当年曾经揭穿过的谎言。我学会了辨别那些精于在车辆前突然倒下的人。我了解那些“速停艺术家”,他们可以随时立即刹车引发追尾。我看到过理疗师和脊椎医师就脊椎伤害案件所写的云山雾罩的报告。我也了解到那些声称受害人有“永久性伤害”的报告是如何写出的,即使实际上一点轻微伤害的痕迹都没有,而医生也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他们怎么会作出“永久性伤害”的诊断?很简单:现在也许没有任何永久性伤害,但是,他们对我们肯定,由于这次事故,能够引发今后很多的“永久性伤害”!

我曾经和那些混蛋律师们进行过荒谬的会谈,双方之间根本毫无信任可言。我会跟某个律师谈话,我知道他在扯谎,我也知道他明白我看得出来他在扯谎。但我们还是得继续谈,面色严峻、貌似理智、语气沉重,好像一场闹剧中的两个主角,被浓雾一样充满房间的欺诈气氛完全包围。

也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在受害人一方。我也见过即使事故在它们的责任范围内,却不愿赔付的保险公司,它们的手段是让得到消息的理赔调解员先于律师赶到现场,并且从受害人那里得到没有受伤的声明。

那段每天与卑劣行径打交道的经历,极大地打击了我对人类的信心。到最后,我脑海中响起颤抖的悲鸣——“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像是敲响的警钟。所有这些谎言和废话让我逐渐形成了对真相的无限渴求。我意识到,真相是那么宝贵而稀有!

那些日子形成的存疑态度一直伴随我此后一生,让我成为一名